

主客感知视角下的文化遗产功能价值评价研究

——以苏州园林为例

顾至欣^{1,2} 张青萍¹¹

(1. 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2.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以苏州园林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社群与游客双重视角探讨文化遗产功能价值构成、影响路径及评价差异。结果发现:①社群认为苏州园林功能效用受其功能内容、经营管理、功能传承的正向影响,而与园林载体条件呈负相关,功能布局仅取决于经营管理水平;社群认为园林功能价值与其建造年代和活化方式有关,对非文保单位满意度不高。②游客认为功能内容、功能布局与经营管理对苏州园林功能效用影响显著,而功能传承和载体条件的影响作用有限,园林功能布局取决于功能载体与经营管理情况;游客评价不受建造年代、功能用途、保护等级等因素的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促进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保障遗产社群利益共享、创新文化遗产管理模式、发挥遗产开发综合效益等建议。

【关键词】:文化遗产 功能价值 结构方程 苏州园林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141(2021)07-0883-08

科学全面的价值评价既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首要任务,也是其开发利用的重要挑战。传统价值评价体系主要从文化、历史、科学和艺术等方面进行价值评判^[1,2],重视对遗产物质形态固有的客观价值进行评估。然而,过分强调客观价值易于将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冷冻保存^[3],可能成为其发挥社会价值的枷锁^[4]。伴随着遗产活化思想的发展,基于社会需求与使用功能导向的价值评价理念开始出现。徐进亮认为,遗产价值包括以遗产特征信息为基础的客观价值和以空间可利用性为基础的功能价值两部分^[5];张心认为,遗产的当代价值是具备多样化的社会功能^[6];赵晓梅认为文化遗产的主客观价值并重,应兼顾不同群体的功能需求,展现遗产的社会与文化意义^[7]。

科学全面的价值评价不仅取决于先进的评价理念,也与评价视角息息相关。长期以来,由政府、专家等权威群体“自上而下”开展的价值评价,因其评价主体缺乏足够的遗产使用体验,而易于导致评价偏差^[8],造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求矛盾与保护管理失当^[8]。为此,基于使用者视角的遗产价值调研已逐渐被认可与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组织积极倡导社区参与遗产价值评估^[9]。赵晓梅认为,遗产价值应当通过人们主观认识进行发现与阐释^[7];程圩认为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最终感受者和评判者,使用者需求的满足是决定遗产价值实现的标准^[10]。苏州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是苏州发展旅游产业、塑造城市品牌的特色资源,其功能价值评价对遗产传承发展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苏州园林为例,从社群与游客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8YJAZH132);2019年度江苏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面上项目(19KJB220011)。

作者简介:顾至欣(1985-),男,江苏省南京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园林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
张青萍(1965-),女,江苏省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园林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

双重视角,建立功能价值评价结构方程模型,厘清其功能价值的影响因素与路径,分析不同使用者的述求差异。

1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伴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对遗产功能价值的关注日益增多。UNESCO 发布的《惠安协议》认为,遗产功能的影响因素包括功能与使用者的关联性、功能空间分布、使用影响、功能发展性、功能适应性、功能对历史脉络的回应等内容^[11];ICROM 认为遗产功能价值取决于社群参与、文化表达与遗产管理的连续性^[12];Prutsin 认为遗产功能价值包括功能意义、功能行为目的、功能转化的可能性、遗产自身的表现^[13];Feilden 认为遗产功能价值主要表现为当代的社会与经济价值^[14];孙志练认为遗产功能价值指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能力^[15];徐进亮认为遗产功能价值既表现为遗产原有功能的延续性,也表现为通过创造性再利用,为创新功能提供空间的能力^[5]。可见,遗产功能价值首先是建立在持续使用基础上的,受到遗产肌体条件与实际使用效果两方面的影响,体现出内在“实体性价值”与外在“关系性价值”的综合效益^[16]。其次,遗产使用效果不仅与功能内容有关,还在时间维度上受到功能传承发展影响,在空间维度上看,受到功能空间布局影响。最后,科学有效的经营管理是遗产功能效用发挥与价值传承的重要保障。综上,研究围绕功能载体、功能布局、功能传承、功能内容、经营管理、功能效用、功能价值等 7 个方面构建理论模型,明晰其相互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而提出研究假设。

功能载体方面:文化遗产功能的发挥是以其物质肌体为载体,这与遗产经营管理的水平密不可分。ICROM 认为,遗产保护就是对变化的持续管理^[12];Mckercher、Cros 认为保存和维护遗产肌体的健康是遗产经营管理的主要目标^[17]。据此,提出假设 H1:经营管理对功能载体有正向影响:

功能布局方面:遗产功能空间布局主要受到功能载体的影响,空间布局变迁直接体现在空间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发展变化之中^[18]。同时,经营管理活动也会通过规划编制、地块控制、空间拓展等手段对遗产功能布局进行调整^[2]。据此,提出假设 H2:功能载体对功能布局有正向影响;假设 H3:经营管理对功能布局有正向影响。

功能传承方面:功能传承是指文化遗产传统功能、文化与场所精神在当代社会中的延续性。首先,遗产物质肌体是其功能传承与文化情感价值得以延续的载体^[19]。其次,经营管理对遗产功能传承也至关重要。ICROM 将管理连续性作为遗产功能传承的保障条件^[12];龚志强、王琬萱认为适应性管理作为一种动态的、面向目标的资源管理方法,有利于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发展^[20]。据此,提出假设 H4:功能载体对功能传承有正向影响;假设 H5:经营管理对功能传承有正向影响。

功能内容方面:文化遗产的功能内容是指遗产物质肌体所提供与容纳的社会活动。遗产功能开发需要依据遗产状况、周边区域等条件进行选择^[19]。从功能布局上看,遗产功能的实现依赖于遗产空间环境;从历史传承上看,遗产当代功能内容需要回应其功能传承的历史脉络^[11],受到原有功能与建造目的的影响^[12]。同时,遗产经营管理方式也会为文化遗产功能活化带来影响^[21]。据此,提出假设 H6:功能载体对功能内容有正向影响;假设 H7:功能布局对功能内容有正向影响;假设 H8:功能传承对功能内容有正向影响;假设 H9:经营管理对功能内容有正向影响。

功能效用方面:遗产肌体的保护与创新有利于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适应性再利用^[22],而遗产的功能效用不仅建立在其空间的可利用性之上^[5],还取决于功能内容的形式与丰富程度^[23]。同时,遗产的功能效用须以遵循其文化属性为前提,尊重遗产原始功能的完整性与真实性^[5]。最后,经营管理方式也对遗产的使用效果产生影响。良好的维持与管理对遗产社群生活至关重要^[24],也有利于遗产旅游活动的开展^[17]。据此,提出假设 H10:功能载体对功能效用有正向影响;假设 H11:功能布局对功能效用有正向影响;假设 H12:功能内容对功能效用有正向影响;假设 H13:功能传承对功能效用有正向影响;假设 H14:经营管理对功能效用有正向影响。

功能价值方面:遗产的功能价值首先取决于其自身的综合信息^[5]与物质生命质量^[13]。陆地认为,改善建筑遗产生存质量是提升其区域社会经济、功能活力的重要契机^[19]。其次,使用是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重要目标,遗产的功能价值来源于遗产不断被赋予的使用功能^[7],其使用功能的发展利于遗产的价值阐释^[25]。据此,提出假设 H15:功能载体对功能价值有正向影响;假设 H16:功能效用

对功能价值有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文化遗产功能价值评价结构方程模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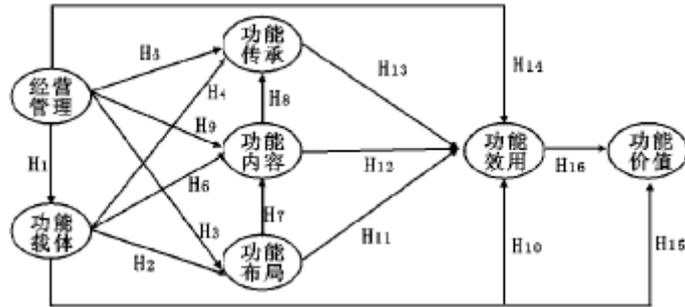


图 1 文化遗产功能价值评价结构方程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测量工具

本文运用 AMOS23.0 软件,按照理论模型编制问卷量表,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构建了主客感知视角下的功能价值评价结构方程模型。功能载体量表依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威尼斯宪章》等国际公约,强调遗产保护的完好性与真实性^[1];同时,遗产利用的适宜性、遗产资源的丰富性和遗产的区位条件都予以考虑^[13,17]。功能布局量表强调文化遗产作为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设计^[26]、功能布局的合理性^[11]和服务设施的健全度^[27]。功能传承量表参考《惠安协议》^[11]和 ICCROM 的《活态遗产指导手册》^[12],从传统功能的延续性、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情感体验的延续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功能内容量表主要评价遗产的使用功能和经营活动情况,其中遗产功能的特色性与多样性是遗产吸引力的重要体现^[11,15],而富有体验性的文化旅游活动也是其功能展示的重要渠道^[4,17]。经营管理量表参考《活态遗产指导手册》和英国国民信托组织遗产管理理念,主要涉及到开发经营的科学性、维护管理的持续性、科技应用的合理性等指标^[12,28];同时,借鉴《国际文化旅游宪章》思想,将使用者参与度纳入评价体系^[1]。功能效用量表考虑遗产对公众活动需求的满足度,突出其作为社会资源的共享性^[29]与功能转化的合理性^[30]。功能价值量表主要评价遗产活化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与生态效益^[19,31]。测量均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其中 5 表示非常赞同,1 表示非常不赞同。

2.2 研究案例与数据获取

本文基于苏州市政府公布的《苏州园林名录》进行案例选择,并尽量满足其建造年代、保护等级等统计因子的多样性分布,包括旅游观光、礼佛朝圣、文化展示、餐饮民宿、办公场所等利用方式。首先,通过预调研对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并完善。2020 年 4 月—7 月间进行正式调研,发放问卷 1800 份,有效问卷 1581 份,有效率为 87.8%。调研对象中园林周边的社区社群占 39.7%,外来游客占 60.3%,其他社会人口统计因子则尽可能地保持均衡。

3 结果及分析

3.1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应用 SPSS19.0 进行信效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量表整体克朗巴哈系数为 0.927,各维度量表信度均大于 0.7,满足信度要求。量表总体 KMO 统计量为 0.929,大于 0.7,Bartlett 球型检验统计量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可进行因子分析。各潜变量

KMO 统计量均大于 0.7, 组合信度均大于 0.6, 观察变量因子载荷均在 0.6 以上, 说明测度项较可靠。潜变量“经营管理”项 AVE 值为 0.497, 大于 0.36, 处于可接受水平, 其他均大于 0.5 达到理想水平, 表明收敛效率良好。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公因子, 主成分因子解释总体变异量达到 69.01%, 大于 50%, 解释效力较高。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求得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所有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矩阵内其他变量间相关系数。同时, 运用因子分析将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经过 6 次迭代后得到载荷矩阵。25 个测试项最终回归于 7 个主成分, 所有观察变量负荷值均在 0.5 以上, 表明因子分析效果很好, 量表区分度理想。

3.2 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本文采用 AMOS23.0 软件对功能价值评价模型进行检测。当 $CMIN^2/DF$ 在 1—3 之间表示模型拟合为优, 在 3—5 之间为可接受。当 RMSEA 小于 0.05, 表示模型拟合为优; 小于 0.08, 为可接受。当 GFI、NFI、IFI、TLI、CFI 等指标大于 0.9, 表示模型拟合为优; 大于 0.8 为可接受^[32]。从拟合结果可见, 模型的 $CMIN^2/DF$ 、IFI、CFI 指标均表现优秀, RMSEA、GFI、NFI、TLI 也达到可接受水平, 两个群组的结构方程模型均拟合良好。

3.3 主客视角模型路径比较

在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检验的基础上, 得到主客感知视角模型的路径系数(图 2)与假设检验情况。依据 p 值和标准化路径系数^[33]进行假设检验。其中, p 值小于 0.05, 表示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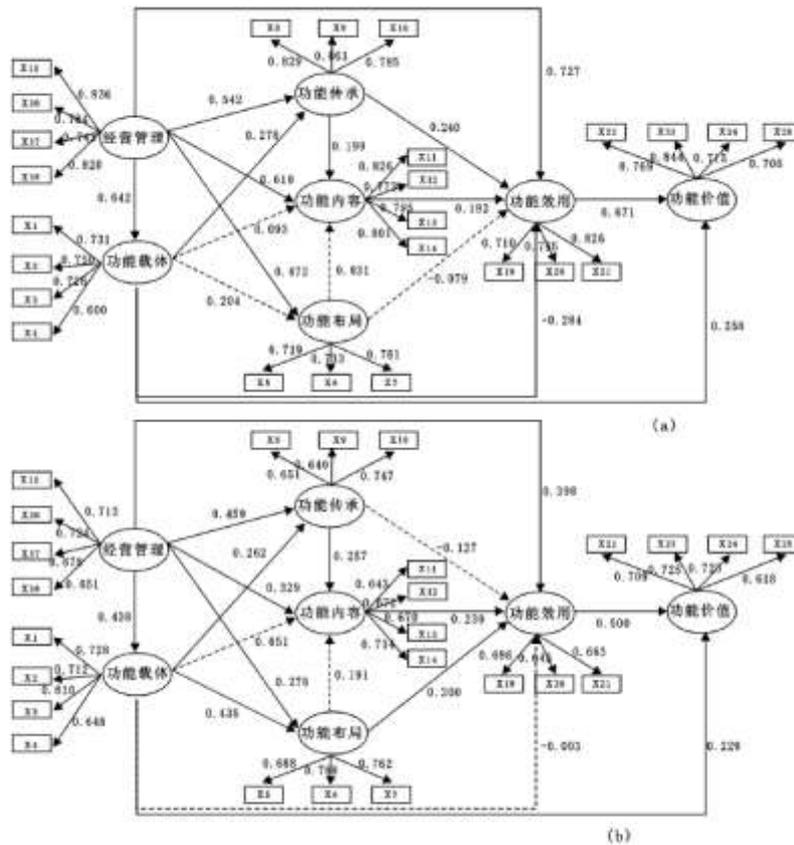


图 2 模型路径标准化系数 (a. 社群视角; b. 游客视角)

首先, 苏州园林载体条件受到经营管理水平的正向影响被验证, 而这种影响力在社群组中表现的更为明显。社区居民因为长

期生活在园林周边,更易于感受到经营管理对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持续性作用。其次,在功能布局影响路径方面,主客评价差异表现在载体对功能布局的影响上。游客认为优越的物质肌体条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园林功能布局,而社群却并不认同。苏州园林在当代社会中的修复利用提升了遗产载体的保存质量。然而,这种遗产修复与功能布局调整往往注重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娱乐需求,而带来的“绅士化”现象却可能对社群生活产生消极影响^[34,35]。因此,受到游客青睐的改造利用模式未必能得到社群的认可。第三,苏州园林功能载体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对其功能传承的正向影响均得到验证,但经营管理的影响力在社群组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第四,在功能内容影响路径方面,两组调查均显示载体质量与园林功能内容没有相关性。目前,基于遗产保护等级的分类开发机制尚未建立,遗产开发的形式与内容主要考虑市场需求,对本身条件与适宜性关注不多,因此与遗产载体情况往往没有必然联系。同时,游客认为苏州园林功能布局情况对其功能内容具有积极影响,而社群调查却并未支持该结论,这种区别源于双方对功能布局理解的差异。游客主要关注苏州园林的空间容量、可达性和设施配置,希望园林具备便捷的交通流线与齐全游览设施;而社群希望园林作为社区的日常生活空间,排斥游客众多的购物、餐饮等区域。因此,两者对功能布局的诉求存在明显区别。第五,在功能效用影响路径方面,游客调查显示功能布局优化有助于使用效果提升,而社群则认为功能传承情况对园林功能效用有积极影响,而以上结论在其对应组中均不成立。目前,以旅游开发为导向的苏州园林修复与功能布局,突出了消费娱乐活动在遗产空间中的重要性,而这种布局调整并无助于增强社群的满意度。游客对苏州园林文化了解较少,尚未建立起从文化情感传承到使用效果评价的联系。同时,调查发现园林遗产肌体质量并不影响使用效果评价,甚至社群调查发现保存较好、资源丰富的苏州园林其使用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该现象也不难解释,部分保存较好的园林出于经营管理考虑,对外开放存在诸多限制。例如:北半园、墨客园修缮良好,但作为酒店民宿一般只对客人开放;留园、网师园历史遗存丰富,但游客众多、空间局限,所以游览体验也不突出。最后,功能价值影响路径与理论模型一致,其中功能效用对功能价值的影响力更大。由此可见,苏州园林功能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效用,而非遗产载体的客观条件。

3.4 功能价值评价均值比较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显示变量间的因果效应及影响作用程度。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可计算出各观测变量的权重^[35],进而得出社群组与游客组对苏州园林功能价值的评价。应用 SPSS19.0 软件,以使用群体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其评价差异。根据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参考对应的均值方程 t 检验显著性指标,发现社群组与游客组在苏州园林功能载体、功能布局、功能内容等评价指标上无显著差异。相反,在苏州园林功能传承、经营管理、功能效用、功能价值等指标上存在组间差异,且社群组评价均低于游客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群对身边园林的传承发展更加熟悉,易于发现传承发展中的文化异化倾向与功能失当情况;另一方面社群与园林情感联系紧密,往往对其文化与功能传承期望较高,因此评分反而较低。社群组对苏州园林经营管理、功能效用、功能价值的满意度不高,则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的园林遗产开发仍主要从旅游者需求出发,对社群日常使用考虑不充分,以至于无法得到社群的认可。

将苏州园林按照建造年代、活化用途与保护等级进行分组,进行 Brown-Forsythe 检验,通过显著性指标判断其功能价值评价的组间差异性。社群组认为苏州园林的功能价值与其建造年代有关,历史年代较为久远的园林功能价值较高,而这一趋势并未体现在游客组调查中。游客认为苏州园林的保护等级与其功能价值没有明显的关联性,而社群对非文物保护单位的功能价值认可度不高。同时,居民认为活化利用方式将影响苏州园林功能价值,而游客评价并无显著差异。不难看出,社群比较看重苏州园林文化与功能的传承与保护,依然偏爱苏州知名园林以及传统利用方式,对于空间较为局限、共享性不足的办公场所和餐饮民宿利用方式评价不高。游客从自身旅游需求或好奇心出发,并不排斥一些保护级别较低,但活化利用方式更加多样化的苏州园林,特别是餐饮民宿作为休闲文化与旅游服务相结合的开发方式容易受到青睐。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主客感知视角,探讨了苏州园林文化遗产功能价值的构成、影响路径及评价差异。从社群视角看,文化遗产的功能效用受到园林功能内容、经营管理水平、功能传承情况的正向影响,但物质肌体保存较好的园林,功能效用并不理想,园林功能布局优劣则主要取决于经营管理水平。从游客视角看,园林功能内容、功能布局与经营管理水平对功能效用评价影响显著,而功能传承

与园林载体条件的影响作用较小。园林功能布局优劣不仅取决于经营管理水平,也与功能载体的自身条件有关。理论模型,苏州园林经营管理水平对功能载体、功能传承与功能内容的正向影响,以及功能传承对园林功能内容的正向影响在主客双重评价中俱被证实。此外,通过均值比较与分组检验发现,社群组对苏州园林功能传承、经营管理、功能效用、功能价值等指标的评分低于游客组,他们认为园林功能价值与其历史积淀和活化利用方式有关,对作为非文物保护单位的园林功能价值认可度不高,而建造年代、功能用途、保护等级等因素对游客评价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根据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以人为本,促进文化遗产活态保护。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指引下,公众的归属感、认同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之一。苏州素以“百园之城”而著称,古城历史风貌不仅与古典园林联系密切,也与生活在其中的市民息息相关。研究不仅验证了遗产功能效用对其功能价值评价的主导作用,还发现了不同使用群体价值观、利益诉求的差异与矛盾,而这正是当代文化遗产活化实践需要应对的挑战。未来,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与社群团体的综合作用,提升公众文化遗产保护与参与意识,通过规划咨询、社会监督、志愿服务等多样化的参与途径,广泛建立文化遗产与使用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政府决策能力,规避企业在遗产开发中存在的弊端,最终促进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世代传承。

统筹兼顾,保障遗产社群利益共享。只有遗产活化符合社群利益,遗产保护与利用才是可持续的,遗产及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地融入当代社会。目前,苏州知名园林被旅游者挤占,难以发挥开放空间的作用;普通园林在功能置换的同时造成原有社群的外迁;而非开放园林则没有作为社区活动空间的功能价值,都导致社群对苏州园林功能价值评价普遍偏低。未来,应统筹考虑社群与游客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明确社群的遗产利益主体地位,保证其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发言权、自主权与受益权。积极通过制定居民游园优惠政策,实施园林社区环境整治工程,开展社群特许经营等手段促进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使用,改善社区风貌,提振社区经济,从而实现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

分级登录,创新文化遗产管理模式。文化遗产分级管理与登录注册制度是针对不同价值的文化遗产采取相应差异化管理方式的保护利用制度,其有效性与适用性已被国际实践所证明。分级登录既有利于在不同等级遗产开发利用时,提升管理效能,促进遗产活态保护,又能够以市场化方式将社会力量引入遗产保护领域,兼顾不同群体对文化遗产活化方式的偏好。苏州古典园林资源丰富,活化利用潜力大,完全有条件推行分级登录管理模式,通过创新市民自发申请、专家把关、国家管控的多元合作保护模式,配套以经济资助和税制优惠等政策,充分挖掘保护等级相对较低,隐匿在老宅古巷中的古典园林资源,合理分流传统名园的环境容量压力,建立以服务社群为导向的公共空间与活动中心,破解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和人力困境,实现“百园之城”的园林遗产群体性保护与持续性发展。

科学利用,发挥遗产开发综合效益。当前,苏州园林文化遗产的活化实践发展迅速,以苏州园林为载体的会展、文创、酒店等功能活化模式层出不穷。2020年,国家文物局《文物建筑开放导则》也提出可探索遗产创新管理与利用方式,探索社区服务、文化展示、参观游览、经营服务、公益办公等活化方式,但推陈出新的效果还有待检验。苏州园林积极融入了博物馆、餐饮民宿等当代功能,然而社群与游客对其价值评价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共享性不足的利用方式,可能会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改变遗产地原有的生活方式及物质环境,从而有违传承活化的初衷。未来实践中,要充分考量功能业态特质与园林载体之间的契合度,既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鼓励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又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综合考虑,趋利避害地灵活应用,从而实现文化遗产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2]Drury P, Mcpherson A. Conservation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R].London:Historic England Publishing,2008..

[3]杨俊,陈荻,张青萍.中国城市古典园林遗产保护预警研究初探[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4):91-97.

[4]吴必虎,王梦婷.遗产活化、原址价值与呈现方式[J].旅游学刊,2018,33(9):3-5.

[5]徐进亮.建筑遗产价值体系的再认识[J].中国名城,2018,(4):71-76.

[6]张心.城市遗产保护中的市民视角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6,(2):43-48.

[7]赵晓梅.活态遗产理论与保护方法评析[J].中国文化遗产,2016,(3):68-74.

[8]Zhao Y.China's Lead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Branding Dali City Through Public - private Partnerships in Bai Architecture Revitalization[J].Cities,2015,49(11):106-112.

[9]Baillie B. 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Handbook [M]. Roma:ICCROM,2009.

[10]程圩.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认知的中西方差异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1]UNESCO. Hoi An Protocols for Best Conservation Practice in Asia[R].Bangkok:UNESCO Bangkok,2005.

[12]Wijesuriya G. Living Heritage:A Summary[R].Rome:ICCROM,2015.

[13](俄)普鲁金.韩林飞译.建筑与历史环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4]Feilden M.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M].Oxford:Routledge,2003.

[15]孙志练.河南省文化遗产价值指标体系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6]何祚榕.关于“价值一般”双重含义的几点辩护[J].哲学动态,1995,(7):21-22.

[17]MckercherB,CrosH.朱路平译.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18]潘怿晗.皇家园林文化空间与文化遗产保护[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19]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20]龚志强,王琬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适应性管理模式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J].企业经济,2019(1):82-88.

[21]Granziera P.Gardens and Public Parks in Cuernavaca:Transformations of a Cultural Landscape[J].Landscape History,2017,38(2):97-108.

[22]常青.论现代建筑学语境中的建成遗产传承方式——基于原型分析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7):667

-680.

[23] 张建忠, 孙根年. 遗址公园: 文化遗产体验旅游开发的新业态——以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 27(1): 142-146.

[24] 张松. 作为集体记忆的城市及其保护[J]. 世界建筑, 2014, (12): 61-63, 123.

[25] 罗颖, 王芳, 宋晓微.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状况及趋势分析——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2017 年度总报告[J]. 中国文化遗产, 2018, (6): 6-30.

[26] 李静雅, 陈可石, 邵浩. 遗产性老城区城市肌理及其公共空间设计理念——以青岛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 (9): 55-59, 76.

[27] 喻学才. 遗产活化: 保护与利用的双赢之路[J]. 建筑与文化, 2010, (5): 16-20.

[28] Loulanski T, Loulanski V. The Sustainabl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A Meta-study[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1, 19(7): 837-862.

[29] Brown J, Terence H. COMPACT: Engaging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Stewardship of World Heritage[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3.

[30] 朱光亚, 蒋惠. 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J]. 规划师, 1996, (1): 33-38.

[31] 杜凡丁, 赵晓梅.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人”, 增冲鼓楼文物保护规划中的一些尝试[J]. 中国文化遗产, 2011, (2): 54-65.

[32] Bentler PM, Bonett DG. Significance Tests and Goodness of Fit in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0, 88(3): 588-606.

[33] 王海燕, 杨方廷, 刘鲁. 标准化系数与偏相关系数的比较与应用[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9): 151-156.

[34] 何江夏, 王雨村. 苏州老城更新的绅士化发展进程及其对策研究[J]. 城市规划, 2018, 42(9): 70-78.

[35] 吴燕虾, 辛金国. 家族企业绩效评价框架结构及指标筛选的实证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13, (2): 137-144.